

毛泽东是如何指导鲁艺的

□ 林晓清

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于延安，1940年后更名为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至1945年抗战胜利奉命迁往东北。在延安共七年半的时间里，鲁艺的成长、发展一直受到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创作了众多广受喜爱的文艺作品，培养了贺敬之、王昆、于蓝等众多抗战文艺工作者，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直接影响了鲁艺文艺创作的方向。

创立鲁艺，为其定名。1938年，延安的根据地建设日趋成熟，教育事业呈现一派蓬勃发展的气象，然而唯独缺少一所培养大批抗战艺术工作干部为主要目标的学校。这年初，为纪念淞沪抗战6周年，延安文艺界联合公演了话剧《血祭上海》，获得很大的成功。毛泽东称赞戏演得好，并建议以这些文艺工作者为基础，创立艺术学院。2月，由毛泽东和周恩来领衔，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人联名发出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文中说明了创立鲁艺的原因：艺术是宣传、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最有力的武器，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已是不容缓颊的工作，因此创立鲁迅艺术学院。在那段时间，大批负有盛名的文艺家们，如文学家田间、何其芳、萧军、艾青，艺术家吕骥、蔡若虹、冼星海等纷纷慕名来到延安，他们的到来为鲁艺的创立提供了雄厚的师资力量。而众多爱国青年和文艺工作者在国家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怀抱对革命的向往之情和救亡图存的使命感，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为鲁艺提供了新鲜血液。外部环境与内部准备俱已成熟，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正式成立。

学校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与毛泽东对鲁迅的肯定和推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推崇鲁迅的高贵品格，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把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总结为“鲁迅精神”。他肯定鲁迅是在文化战线

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以鲁迅之命名鲁艺，代表了毛泽东对鲁艺的深切期望，也代表了他对抗战文艺发展的期望，他希望将鲁艺作为“鲁迅精神”的延续，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发挥文艺急先锋的作用，为抗日民族斗争多作贡献。

指导鲁艺实现创作风气的改变。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后，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抗日文艺运动得到蓬勃发展。当时延安的大多数文艺工作者主要来自上海、北平等大城市，身上带有小资产阶级的特性，与无产阶级的工农兵大众在思想上存在着差距。当时鲁艺提出正规化、专门化的办学方针，试图在延安复制正统学院派风格。鲁艺的艺术家们沉醉于追求高雅艺术的倾向，把曹禺、夏衍、莫里哀、契诃夫等中外作家的名作竞相搬上舞台。小资产阶级的出身也使得相当一部分作家只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缺乏对工农兵的接近、了解、研究，描写的人物穿着劳动人民的衣服，却顶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孔。这种“关门提高”的方式，使鲁艺的创作极其缺乏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当时鲁艺的新校址桥儿沟，紧邻农民的场院，但不少师生几乎不与农民往来，根本不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和农民的喜好，更别提创作真正的抗日文艺作品。

整风运动开始以后，为了改变延安文艺界的纷繁乱象，破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使它朝着无产阶级抗日文艺的方向发展，党中央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讲话》中，毛泽东首先回答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强调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他认为文艺的创作只有实现大众化，才能赢得群众的喜爱、达到广泛的传播。5月30日，毛泽东到鲁艺看望师生并发表讲话，勉励他们：只在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到大鲁艺学习，这个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由此彻底扭转了鲁艺的创作风气，为鲁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使鲁艺师生的面貌焕然一新。

在作品中实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对于如何实现文艺大众化的问题，毛泽东从抗日斗争和现实需要出发，对文艺工作者们提出明确号召：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与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创作出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作品。1938年4月28日，鲁艺刚刚创立不久，毛泽东即应鲁艺师生的邀请，来到鲁艺作了一堂生动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形象地把艺术作品比作饭菜，既要有营养，还要有好味道，既要有内容，还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在当时就是要适应抗战的需要，贴近百姓的实际生活。鼓励青年艺术工作者到广阔的实际生活的大千世界里，真正走入群众去学习、汲取养料，积累写作经验、掌握艺术技巧。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毛泽东再次鼓励鲁艺师生要与广大人民群众在一起，把民间的文艺形式加以提高，变成文艺的参天大树。《讲话》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包括鲁艺在内的延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文艺家们掀起了下乡、进厂、上前线的热潮。在探索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上，鲁艺率先发动，吸取多种民间文艺样式，加以改造、发展，创作出了一些既不脱离民俗原貌、又增添了文学艺术性的新的文艺样式，创作出了一大批深入生活、面向群众、鼓舞斗志、深受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兄妹开荒》、民歌《东方红》，还有木刻版画等都是这一时期鲁艺的代表作品。

毛泽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在鲁艺贴近群众生活的创作中得到了具体实践，根据地的文艺更加丰满壮大，达到了文艺为鼓动抗日、激励人心服务的目的，也成就了一代鲁艺人，使他们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艺术家。

秀水泱泱 英魂永铸

——秀水河子歼灭战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韩 雪

拉开东北解放战争的序幕

面对违背停战协定、武器装备远远优于我军的骄横之师，如何打好这一战，以决定东北今后大局？惟以英勇无畏之精神，敢打必胜之信心，以精锐之师，寻敌薄弱之处，求得坚决彻底的各个击破。东北民主联军集集体智慧，制定契合实际的精细战术方案——我军历史上善用的“一点两面”战术，将主要兵力集中于敌薄弱点，以巨大的突破力和后劲形成纵向发展，从多面包围迂回敌人；把握最有利之时机，于敌孤军深入立足未稳时各个击破；同时，充分发挥我军敢打敢拼和善于发动群众的优良作风。这场战斗打掉了美蒋的气焰，打掉了国民党军的骄横，打破了全副美械武装之敌战斗力强的神话，大大增强了我军战胜美械装备国军的信心，既守住了东北的大门，又开创了围歼国民党军、解放全东北的新局。

肝胆铸魂浩气存

2月的秀水河子天寒地冻、滴水成冰。透骨的北风翻扬着冰冷刺骨的雪花刮在脸上，一阵疼痛一阵麻木。但1师、7旅的战士们士气高昂、热情高涨，战士们高喊“只要能打上仗，再冷也不怕”。一个战士从大雪地中拔出一只脚，高声说，“老天爷发给我们白毛皮靴了”，部队里充盈着积极乐观的革命主义氛围。战斗中战士们争先恐后、英勇杀敌；村民组成担架队，以被子、门板作担架运送伤员，将自家的梯子拿给部队助攻；战士的干粮袋里装的是老百姓自家仅有的苞米噎



子。这场战役，老百姓看到了我军的勇猛气势和无畏精神，而百姓的全力支援更加鼓舞了我军的斗志。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美式装备、钢铁盔甲，战斗一度处于胶着状态，但东北民主联军的指挥员们骁勇善战，战士们英勇无畏。敬读碑文，英雄们的群像仿佛跃然纸上，1师2团8连连长张文祥，不顾伤痛勇猛地扑向敌军抢夺机枪，生命永远定格在27岁；1师2团在敌军的密集火力下发起突击，在付出巨大牺牲后拿下敌军重兵布防的北山；7旅主力突入敌阵地，与敌展开激烈巷战；担任阻援的部队于秀水河子以南小荒地，将敌方援军52军2师6团击溃……正是英雄们的敢打敢拼、前赴后继，才在我军武器装备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赢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

秀水河畔，松柏仰天，浩气长存。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中央苏区时期党如何为群众谋利益

□ 朱一华 黄鹰西

中央苏区时期，党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是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根本所在。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要“始终代表最广大的贫苦工农群众，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号召，强调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工作都要从群众利益出发，切实解决好工农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这一时期，党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工作中都彰显了为群众谋利益的生动实践。

政权建设保障人民权力。政权建设是中央苏区时期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探索中最重要的方面，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力得到保障，是其他权益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中央苏区的苏维埃政权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最高行政机关是中央人民委员会，地方设省、县、区、乡（市）四级苏维埃政府。中央苏区时期共建立省级苏维埃政权5个，县级苏维埃政权119个。苏维埃政权的广泛建立，为保障人民群众权益提供了强大政治支撑。

在中央苏区时期，政权建设广泛而牢固的原因在于赋予了每个人基本的政治权力并使民主选举意识深入人心。《苏维埃组织法》明确规定凡年满16岁以上之男女而非从事剥削的劳动者，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使得苏区群众在历史上第一次享有了最真实、最广泛、最管用的政治权力。但是，由于长期遭受封建思想统治和压迫，普通群众几乎没有民主参政的权力意识，对民主选举的意义也茫然无知。为此，各级苏维埃政府做了大量细致的宣

传工作，使中央苏区的选举工作深入到了乡村基层之中。广大劳动群众通过行使选举权来参与并主导自身权益的保障，这与乡村以往依靠宗族制度来维护统治秩序截然不同，使群众实现了历史性的翻身做主。在中央苏区后期，选举工作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比如，江西的选举运动在大多数地方已经热烈地进行，并且广大妇女也参与到了选举之中，妇女代表占25%以上。民主选举制度的推行，保障了群众的政治权力，使得广大群众在政治上获得平等，同时也大大地提高了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

经济建设增加人民收入。党在中央苏区时期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确保人民的生存根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但土地革命之前农村土地分配极不合理，广大农民长期过着悲惨的生活。为了将广大苏区农民从残酷的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党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分田运动，使中国农民第一次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也使得党和苏维埃政府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

土地问题解决之后，中央苏区的农业生产仍然面临着劳动力、耕牛、肥料、种子、资金等严重不足的现实问题。为此，苏维埃政府本着群众自愿的原则，成立各种生产合作社，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生产合作社的广泛建立充分利用了农村的生产资源，给农民带来了极大便利，解决了农业生产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如粮食合作社不仅可以制止粮价暴跌，保障农民收入，同时还可保障军需，对巩固和发

展革命根据地有重大意义。各种生产合作社在中央苏区遍地开花，仅广昌县就成立了70个粮食合作社，吸纳社员22000多人，极大地解决了广大苏区群众农业生产中的难题。毛泽东、邓子恢等领导的亲自提倡和大力推广促进了中央苏区合作社经济的发展。至1933年3月，江西、福建两省17个县已成立各种合作社1423个，股金30余万元。中央苏区合作社经济的繁荣发展在改善农民群众贫困生活、冲破国民党经济封锁、巩固工农革命联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会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重视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围绕卫生防疫、社会救济、文化教育等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增进了民生福祉。

开展卫生防疫运动增强了人民群众身体素质。中央苏区的卫生防疫运动不是单单靠着少数政府人员去做的，而是主要依靠群众的参与。为了将群众彻底动员起来参加卫生防疫运动，党和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先是利用报刊、标语、群众大会等方式进行通俗易懂的宣传，然后在群众间开展大规模、高频率的卫生竞赛，同时还以制度化的方式规定了每月两次的“卫生运动日”，并且瞄准党员干部、在校学生、家庭妇女等“关键人群”进行专题卫生知识辅导。中央苏区的卫生防疫运动巧妙地运用了群众的力量，使其卫生防疫状况得到改善，保障了群众的身体健康。进行社会救济确保了穷苦群众

的基本生活需求。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苏维埃政府虽然经费不足，但仍然不遗余力地救助困难群众。为破解社会救济所需的资金和物资匮乏难题，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措施。一方面，广泛组织成立互济会，引导贫民在会内互帮互助，共同渡过难关。另一方面，大力发动群众进行募捐，在苏维埃政府的宣传和鼓动下，大量群众踊跃加入“临时募捐”和“沿途募捐”的行列。半升糙米、一件破衣、几斤蔬菜、几两油，如今看来不起眼的物品都成为当时募捐的宝贵物资，并用此及时解决了群众迫在眉睫的生活困难。中央苏区时期，面临经费不足的战争环境，党和苏维埃政府仍然想方设法开展对困难群众的救济，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直观体现。

普及知识提升了群众综合素质。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通过大量建立列宁小学、各种夜校、俱乐部、识字班等组织和团体全方位普及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广大苏区群众既获得了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与权利又加深了对党的革命路线的认同和拥护。如广昌县至1933年底，共建立了124所列宁小学，在校学生数约占儿童总数的80%，全县有各种夜校58所，俱乐部（读报、识字、唱歌等）32所，各种识字班1651个，普遍提升了群众的文化素质。同时，在中央苏区各地还广泛成立歌咏队、业余文化俱乐部等文化团体，活跃并丰富了苏区群众的文化生活。